

自序

此文為王煒文於 1997 年所寫「歲月的見証」一書所作的序言，在某個時間片斷而言，此文亦可算是作者至 40 歲前一個簡單的自傳。容他在這裡用他的方式作個自我介紹吧。

「日午畫船橋下過，衣香人影太匆匆」。

過去了的人與事，很多時就像是觀看一齣以極高速度回翻的影帶。匆匆，似乎正是對生命最貼切的描述。

回想間，不久前自己還好像是個身穿不太整齊的校服，背著一個印有甚麼航空公司標誌的旅行袋式書包，一身汗臭地拿出月票趕乘巴士回校上課的少年；母校的一草一木、上堂時老師對課題的講解、課室內聖誕的佈置、同學的追逐和嬉戲、少年人的為賦新詞強說愁……，這一切一切，還歷歷在目。

轉眼間又踏入現實的人生，開始了自己的工作生命。第一份工，我被派到一個荒遠的建築地盤去，日曬雨淋，早出晚歸，迫使我過著一段差不多隱逸離世、與人寰斷絕的生活。第二份工，困坐在冷氣大放的辦公室裏，朝九晚六，有時還要加班一、兩小時。一張闊大的寫字枱與上司面對面坐，有如困獸鬥。第三份工，又要……；年青時欠缺忍耐、

不知恒心爲何物的我，五年四份工，實屬等閒。

其間，也有談談戀愛，但一個笨頭鈍腦，其貌不揚，性情內向孤僻而又自尊心強的我，愛情道路自不免會十分吃力，也帶來了無奈和創傷，叫人心力交瘁……。

如今靜坐案前，回想前事，真有如詩如夢之感，總之，是非經過不知難，一切就是太匆匆。匆匆還匆匆，人到中年，剛剛站在人生與事業的半途，難免有一份本能衝動，想爲自己作個中段檢討，以確定自己在生命歷程中到底身在何處。對我而言，這個檢討也並非單是要計算一下過往的得失；去者已矣，我無心計較。過去是樂是愁，是喜是悲，道路行正了還是踏入了岔途，我也心內無悔。人總有自己的路，管你機關算盡又如何？我尊重我的過去。但無悔歸無悔，以後要走的路我是否還會樂於用過往、甚或是目前的方式去完成，才是這番檢討的重心。

對過往略作計算，才猛然發覺我的工作生命原來已經過了幾近二十年，以平均人一生工作約四十年計，我正好站在事業的中點。無奈生爲男兒身，工作不是生命的全部，也是生命的一大半，因此對生命的檢討，我也不能不以工作或與工作相關的經驗，作爲主要的評價準則。工作對生命所帶來的價值，當然也不能單靠職位或收入的高低作準。

過去二十年的工作，無獨有偶，也清晰地分爲兩個差不多相等的段落。前十年我在一般商業或公共機構內從事與建築有關之工作，之後便執起教鞭，成爲一個專業講師，爲時也近十年。

前十年的工作唯命是從，上司的指令便是我工作的方向。在這段期間，在個人的行爲和價值取向上，我的心態可

以說是唯利是圖；那些因素可以爲自己或自己的工作帶來更多的「著數」，那便是我做決定的準則；那一間公司可以多給一千數百元的薪酬，那便是我的新僱主。當然，這是最短視不過的。或許，我也不屬於那類有能力放下自尊便能急急冒起來的「世界仔」，所以儘管我一切已「向錢看」，到頭來我也只是落得勞碌一番，十年過後，工作仍似在原地踏步。這段時間內生命是停滯不前的，更談不上甚麼有意義的成長和進展，工作乏善可陳，我也沒有爲生命奠下可堪回味的基礎。

後十年的教學生活到現在恰巧也分爲兩段。前五年我在工業學院內任教，對象是一些中五或等同程度的學生。在後近五年裏，我轉到了「大學」內任教，所教的也由「文憑課程」提昇爲「高級文憑課程」。所以，從這角度來說，我是「晉陞」了的。我性本淡泊，晉陞與不晉陞，對我關係其實不算太大。

雖然我不計較晉陞與否，但從兩間學校所面對不同的學生及教學環境裏所提供的條件來看，工作的轉變確實對我的思想和性格發展構成一定的影響，使我的人生態度產生變化。

十年前我所任教的工業學院是個頗官僚保守的架構，人事及教學作風慣於因循，十年如一日；只要安於本份，聽話服從，加上對上司肯表達多一點「敬誠」之意，一切事情便好辦。可惜，經過了十年在外間世界的掙扎而未能妥協下來的我，來到了這裏，在相對的工作自由與自主下，年少時許多的「理想」逐漸又再復燃。這與我戇直而又剛烈的性格相配合下，正好與那個保守的架構形成強烈的對比。在這種工作環境所帶給我的機緣下，想不到竟然爲我的生命也擦出了一點

火花，但不幸地，也給我和我工作的機構帶來了一定的麻煩和騷擾。

工業學院的學生大多數是十七、八歲的青年，平均學歷只有中學會考四至五科僅僅合格的成績，部份連這程度也沒有達到。但技術課程有其長處，就是大理論不多，要求學生的創意不強，在講解一般的技術知識時，學生學歷的高低與吸收能力因此不致構成太大的影響。所以，學生以這種成績入讀這類文憑課程，對他們來說其功效是頗顯著的。這對老師來說也會感受到一定的滿足，因為我們可以目睹他們在這短短的兩年課程時間內身心的明顯成長。十七、八歲的青年人，其吸收和處變能力，很多時是超乎我們可以想像的。

這類課程在授課時所採用的可以說是人盯人的「人力密集」方式。授課時每班在一位老師的帶領下，加上班數不多，師生的接觸極為密切，師生的情誼發展頗深。況且在教學及教務上的工作校方要求不高，在備課與上課之餘，我仍有充裕的時間和閒情，可以多關心學生的事務，甚至是自發地協助學生多辦一些活動，互相打成一片。這其實提供了我一個機會，使我可以用一個近乎中年人的心態重看少年時的段落，給我帶來了一定的開啓，使我回看了很多我當年所未有留意到的事情，甚至是重開了我已曾失去了的「赤子」之心。

在初執教鞭和與這類學生相處的這幾年裏，基於工作環境不存在重大的利害衝突，我也沒有與別人爭競之心，我察覺自己主要的轉變和發展，可以說是由「功利」過渡回「重情」。其間的感覺當然是和平而幸福的。「情」在現代社會裏已實屬侈奢品。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對工作裏的服務對

象，在工作的環境內能用得上真情，滿懷歸屬，這種感覺是其他物質價值所不易取代的；這種經驗，也不是每個在職人士可以有幸享有。

之後，我轉到了前城市理工學院任教，至今也快近五年了。

我所教的「高級文憑」課程是一個頗叫人感到尷尬的學歷。在那裏就讀的學生是大專生而又不是大學生。就課程內容而言，學生所讀的科目與內容的深入程度，與同科的學位課程，又幾乎並無二致，大家也共用著校內的相同設備，主要所不同的，只是師資和教學的方式有別。最少，他們是如是說。

「高級文憑」課程所收的學生，約有一半是有接近中七程度的，另一半則為中五學生，其他部份時間制的學生，則大都持有有關文憑或證書的學歷。與大學所收的學生的成績相比，這類學生當然有所不如。但我校有個較突出的「傳統」，就是管它是甚麼程度的課程，內容一律都份量十足。無論是派發的筆記、作業、授課時間、測驗及考試等，都與其他院校近同的課程，在數量上為多。因此，雖然學生的入學條件較學位的成績為低，但三年課程「操練」出來的學生，成績卻又出奇的好，人人聽教好用，為僱主們所樂於聘用。

因為資源所限的理由，上課時我們採用的往往是數班合併授課的形式。有時一大班學生人數由八、九十至百三、四十名不等，上課時場面可算是極為壯觀。大專學生貴乎自重自發，上課不用點名，這也導致了在課堂內學生的流動性很大，學生缺課的名目繁多。因此，很多時講師根本連學生的姓名和容貌也記不清楚，更遑論建立密切的師生關係了。

高等院校近年人人談優質教學；研究、著述及其他學術發展，成爲每個學人的存亡所依。我教的雖然是學位以下課程，但在同一屋簷下，我也感受到其間鉅大的壓迫感。與以往在工業學院相對保守的行政模式相比，這裏的行政作風可以說是大膽創新。校方每每強調能把握時代的最新脈搏，帶動管理潮流，看成爲是本校的強項。這對機構內的每一成員而言，自然也分擔了不少的工作壓力，甚至很多時成爲一些前衛的行政構思的開拓者。這當然是專上教育大勢之所趨，在國外早已形成了氣候。他們也是如是說。

無論實際果效如何，我也不會否認在大學濃烈的人事、學術與文化氣氛下，確能提供教師較好的自我發展條件。所以，一向散慢的我，到了這裏後，也逐漸開展了一些較「學術」的工作，例如是參加一些學術會議，做些最簡單不過的研究和論文，或跟進一些與自己專業有關的技術項目。行之以時後，竟然也略見功效；最少，與以往在工業學院任教時相比，已算是我在專業和學術上的一大進步。

整體而言，近數年的教學生活確是令我起了一些明顯的改變。舉例說，與學生相對的接觸是比較少了，而閉門做文章的機會卻又增多；死板板地留在校內跟著時間表做人的生活方式少見了，外出「公幹」接近自己本科專業的次數日見增多；再加上在人人都談理念說道理的大學裏，重「情」只會引來笑謔，使自己處處碰壁，所以我性格裏「情」的部份被迫逐漸收斂。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我能用情的時間和機會自然變得少了，人也漸漸習慣多談一些「理念」，這導致了我在思想、生活和工作上又再次回到了缺少人味、較機械的軌道上去。

最初自己對這個轉變仍未能自覺，但其後檢察一下自己近期所寫的文章，檢討自己在教學，或是在對待學生時態度上的轉變，才漸漸察覺到自己已不再如前的一片情切切，內心滿溢著熱熾熾的感覺。這可能是一個由「重情」回到「淡情」的過程，其間也不排除因爲公事和其他「俗務」日漸繁多，而消磨了我對學生、教育、甚至是人生的濃情厚意。因此，平心而論，近年我在思想和情緒上的種種變改，我也不確定是一種進步還是倒退。而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对現在所做的一切，已沒有如以往的感到理所當然，有擇一善而固執下去的豪邁。亦可能是慣於懶散的我最近在種種機緣巧合下被迫看多了書，才發覺萬事萬物背後的道理原來竟可以是如此的繁多，在「理」的重擔下，我只有比前變得更爲謹慎，在「真理」面前人也更容易感到害羞，我對自己的思想行爲也變成疑慮更多了。

但有一點我還是十分堅持和固執，就是基於政治見解歧異而引起的思想意識形態的立場問題。這意念在香港人的政治共識下，我一向是感到極難辯解的。我唯有從我的政治與民族思想發展史說起。

讀小學時當年大家都很喜歡「畫公仔」，男孩子更喜歡畫一些飛機坦克大炮之類等事物。有一次我畫了一架飛機，跟著隨手在機身上寫上「USA」的標誌。即時鄰座的同學怒氣沖沖地質問我，爲何飛機上不能寫上「中國」？我心想，這個問題問也不無道理，爲何我隨手所寫，一定便是「美國」？這便是我第一次建立了國家與民族觀念的因緣。年紀大了後再回想，其實類似的問題我仍是不停地反問著自己，甚至是整個社會，例如是爲何我們隨意所選擇的便是飲可口可樂吃漢堡

飽，看的便是米奇老鼠等和路迪斯尼卡通？顯然，這都是受到無形但又無處不在的文化壟斷所薰陶下，社會環境對人的行爲，以至是思想意識，產生潛移默化之功所致。

讀初中時，正爲六〇年代末文化大革命之時，而與我家同住的表姨也正在「拍拖」。表姨的男友是個不太活躍的左派工會成員，他很多時有一些免費的文藝會之類的門票，可以招待我們去參加一些「文藝活動」。因此，我當年也看了很多諸如「紅燈記」、「白毛女」、「紅色娘子軍」和很多的中國民謠、舞蹈、演奏或電影等節目。記得有一次在上環高陞戲院參加了一次綜合文藝晚會，壓軸是一個全場大合唱，在唱完了「東方紅」和「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後，人人都心內澎湃，激昂不已。幾乎從未踏上過中國土地的我，心內也感到正炙熱地流著祖國的血。其實，這與很多宗教儀式所能營造的感染也頗相近。無論如何，自此過後，我想我已是個典型的「左仔」。典型的「左仔」是盲目的，正如很多激烈的原教旨或民族主義者一樣。

可幸，當年我所讀的教會中學是間薄有名堂的名校，在教會的管理下受西方文化思想影響頗深，這正好給了我一個在思想上的平衡。加上文革之高溫很快亦過去，我才有機會可以回轉成爲一個「正常」的青年。但自始至終，可能我與大多數背境和年紀相若的香港人不同，我仍是對自己的祖國充滿著情懷，對國事衷誠地投入和關注。

關注可以有很多形式，而我採用的，我自信還是屬於理性和全面的。尤其是當年紀漸大，人情世故漸深，我對自己國家的民族、文化、歷史、地理、民情，或政治及經濟的發展和運作等逐漸認識，再加以客觀地與其他社會和文化體系

作比較，我對中國的認識和理解，我想是有其全面性和準繩。至了今時今日，我不會承認自己是個左傾份子或是個民族主義者，雖然很多人聽了我的言談看了我的文章後會如是說。我只是將自己對中國的整體觀看成爲世界政治和人類文化大統下的一環；言談中我所提出的政治見解，也只是我對真理求索時的一個過程和實踐經驗，最後爲真理和正義而說點良心話罷了。

在香港很難談政治，尤其是反主流的政治。人對生命未能透徹洞悉或未嘗經歷過刻骨銘心的危難，人對政治、以至是對真理的觸覺，難免會顯得膚淺，或帶有既得者的心態，對是非和大義的體察，易會流於自保和利我的片面。這亦正是香港人在認識和面對超我的真理和道德觀念時的困難所在。在香港的主流政治觀自然是奠基於西方的個人主義和自由經濟概念上，含有高度的功利主義成份。但對歷史、民族、文化與自然條件均差異極大的中國，這概念在一時間是極難直接移植到中國來的。假若要將這類西方色彩極濃的思想或政治體制引入中國，（正如很多香港人正積極地這樣做），希望中國從「落後」中「改造」過來，這似乎已帶有武斷的批判意味，認定西方文化的絕對優越性，而不明白到文化與地緣的相關現實。這樣做不但欲速不達，而且更可能干擾了中國的自然穩定發展。

就是這樣，加上九七將臨，香港與中國的各種連繫日漸加強，所以，近年我也開始多寫了一些反映香港與中國關係、略帶點政治成份的文章，但可惜論調遠離主流，自己無形中又再被別人看成了是個「左仔」。然而良知所在，逆耳的說話我也顧不了，要說的話我還是會說。

在我們「教育眼」內的一批想過一下「作家癮」的「作家」中，我算是個多產的作家。但自從九二年我輯錄了「情牽教育路」一書後，到現在也已四年多了，我仍未「敢」將過去數年間所寫的閒散文章再次輯錄成書。其中主要的理由，是我不能為自己交待，為何自己的文章的內容和風格，會是如此的不相貫徹；前書是那麼的悠情處處，而今次這本書的文章又是這樣的剛烈倔強，軟硬程度差異頗大。

除此之外，雖然名為「教育眼」作者，我所寫的文章大部份看似均與教育無關。我談的或是評論的大多數是一些人生哲學理想，或是一些我個人的世界觀、文化觀，甚至是社會和政治觀念等事情，實有「霸」著「教育眼」一席而胡亂發揮之嫌。

我時常感到，在「教育眼」的同人中我是屬於較另類的一個。我是個半途才出家的教師，之前毫無教育訓練可言。我教的不是中、小教，亦不是正統學術味濃的大學。況且，身在大學任教的其他「教育眼」作家也大多是專攻教育學為主的，所以，他們在教育理論和實踐上，事實要比我「到家」很多。我連在魯班門前弄一下斧的資格也談不上。我只能避重就輕，少談一些教育理論。

教育理論與其他人文科學理論有很多近似之處，其一便是知易而行難的問題。在香港教育界的工作環境裏，基於香港獨特的社會結構、教育制度、業內文化，或其他學校所面對的資源等問題，教育工作只見困難不少，吃力而難見成效。

教育理論的實踐作為一個小實驗在學校的一個特定試點內試行一下，希望引起一種啟發，或在沉悶重複的工作裏作

為一點衝擊或調劑，肯定是值得鼓勵的；但將這些理論在學校的前線上全面實踐，我想，在現有的條件下，絕大部份都不可能輕易辦到。就算是真的做到了，我覺得其意義亦不會太大，因為學校環境變數奇多，找著了其中的一、二，便以為可以掌握準確的全面觀察，這可能只是自我慰藉式的科學觀罷了。我不能不承認其間的無可奈何，理論與實踐、前線與幕後，先天性地是存在著一定的分歧、矛盾和脫節。

執著於與教育工作直接有關的理論和小節是一種「微觀」的視物方式，無庸置疑，這是有其作用和必需性的。可能我有較深的近視眼，我不習慣看太近的事物。傳統的價值觀認為，教育的終極目的是為社會樹立一批情懷高尚、富使命感和有學問才幹的人作為社會的棟樑，使社會可以朝向更高的精神和物質境界發展。當然，現代社會在制度的羅網和重壓下已作出了妥協，教育的目的事實上早已自動地作了調節和修改，去迎合一個功利的社會現實，但無論如何，教育的原先精神與目標，是沒有人可以提出異議的。

不過，在妥協中很多事理在社會的新觀念下會日漸變質，譬如甚麼算是高尚的情懷？甚麼是學問和才幹？責任的範圍又在那裏？在妥協的再定義下權衡學問和才幹，差不多變成是看誰最有能力和方法以最快的速率達到成功的、以至是個人的物質目的。盲目的進步和現代主義成為社會的金科玉律，社會亦變成了一個只知疊積、擴展和吞噬的機器，社會的發展與教育的原先理想日漸遠離。人已喪失了懂得冷靜地去思辨的能力，人人只是人云亦云，人跑我跑，就像是動物紀錄片裏的非洲角馬。

在這份冷眼世情的心態下，我覺得執著於過份「微觀」的

工作方式已難見整體成效。這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解釋到為何我們的教育架構，已經是一日比一日的精密和龐大，管理的理念和手法一天比一天的精妙，投入的資源一年比一年的多，而學生的質素卻沒有同步的增進。明顯地還有很多外來而有力的因素正在影響著教育的效果。而這些因素其主要的來源正是我們身處的社會——一個由功利主義和被紊亂的思想價值意識所支配著的社會。

所以，當我談社會現象，說潮流文化，或討論商業行為、國事或政治等事物，我其實已是在談教育，在「宏觀」的角度下談教育，或提出在教育實踐的失效下的總體社會效應。我不承認我是佔用著「教育眼」一欄的空間而任意發揮，高談私人的觀點。

本書這「序」其實不只是我對自己生命作個中段的檢討，也是我對自己的人生思想航向的一次覆核，其中尤以近這十年裏自己在航道上所出現的「轉向」為重點。在時光的洪流中轉變是難於避免的事，但這些轉變是出於對生命的一種消極妥協，是一種正面而積極的自然調校過程，還是自己在複雜的人生道路上出了偏差？這都是我此番所希望探求的。除此之外，這序也是我對自己和對我仍感到興趣的讀者的一個交待。

我的感情和思路發展曾經由「重理」而漸入「重情」，再由「重情」漸回「重理」，當然，其間所經歷的絕不會是一次突變。而且所謂重情或重理，也是屬於相對的性質，在任何時間內，我相信我的觸感中還是情中有理，理中帶情，甚至情理兼重，只是比重不同罷了。

對情理的依重和轉變中，亦可想見我在情情理理中恒常

所感受到的挫折、困擾和不安。有時撫心自問，在情感上遲鈍或慣於主觀直覺的人其實有其好處和幸福，因為他們不會容易為煩擾的生命現象所負累，或在對生命的探討時墮入不必要的苦惱中去。他們的人生進程因而亦會較為暢順，生活變得更有「效率」和成功。

但，儘有種種問題和疑難，我仍是無悔，因為每人都有適合自己行的路。我不會強求。